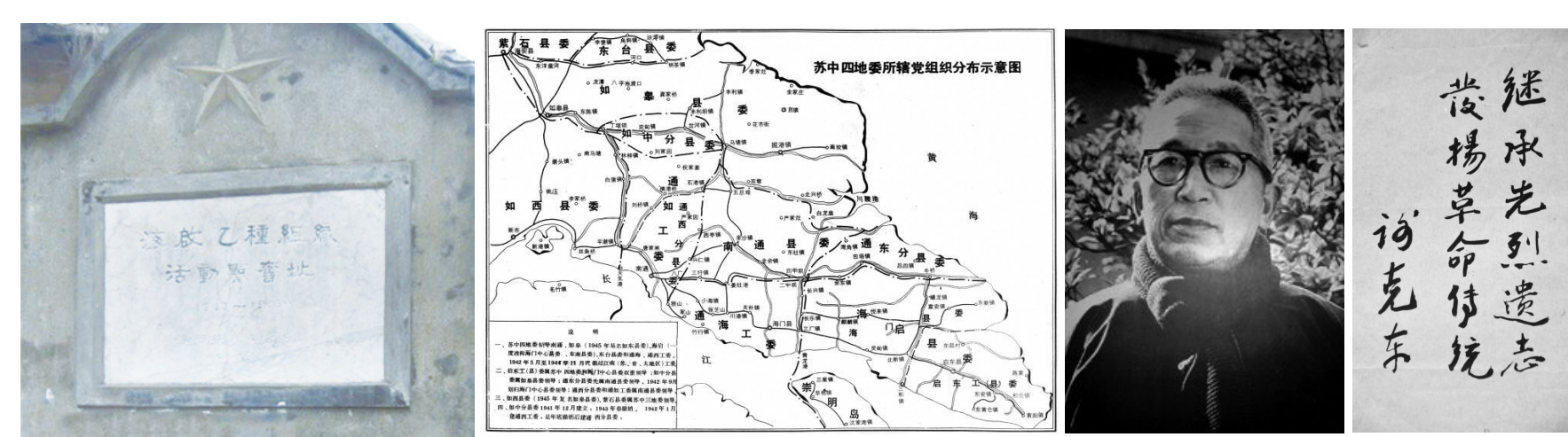


谢克东与通如海启的“乙种组织”

□陶建明

谢克东(1911—2001),上海金山人。193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及西北抗日联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0年7月新四军东进后,他踏上南通的土地,担任如皋(东)县委书记、如东警卫团政委等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1月,任苏中四地委秘工部部长,从事秘密工作,建立和领导党的秘密组织,外称“乙种组织”,为革命作出特殊的贡献。下图左起:海启乙种组织活动点旧址,苏中四地委所辖党组织分布示意图,谢克东,谢克东题字。



苏中四地委所辖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建立通如海启的乙种组织

1942年底,日伪策划大举针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清乡”。为应对复杂艰险的形势,苏中区党委、四地委为吸取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在根据地 and 敌占区建立秘密组织,从一部分没有担任过公开行政职务、面目“不太红”的党员干部中,选择一批精明强干的同志隐蔽下来,建立秘密工作机构,对外称“乙种组织”。

1943年1月,四地委成立秘密工作部,任命谢克东为部长,统一领导通如海启的乙种组织,并将地委及其下辖县级组织掌握的部分秘密组织和直接联系的一些党员,划归秘密工作部,组成一个直属地委主要领导的具有区域性、层级化的工作系统。

乙种组织坚持单线领导,不发生横向联系。各县、区设特派员,地委设秘密工作部。县委特派员受县委和地委城工部双重领导,以地委秘工部为主。区特派员只受县委特派员的单线领导,和当地区不发生横向联系。为了避免破坏和损失,整个组织之间、党员之间,一般以单线为主,甚至有的区正副特派员之间也不发生关系,组织十分严密。

地委首任秘工部部长谢克东具体领导通如海启各县组建的乙种组织。在谢克东的领导和周密部署下,乙种组织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工作方针,将“忠诚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作为秘密工作的根本,将“合法身份,灰色面目,单线联系,横向隔开”作为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准备在各种公开的党和政权组织遭到破坏、活动受到阻碍限制、不能坚持斗争时,上级可以通过乙种组织,保持与各基层组织的联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必要时,由乙种组织出面领导群众坚持对敌斗争。

地委秘工部机关设在海门

1943年1月,谢克东走马上任,冒着日伪在海门地区进行重点“清乡”的危险,将地委秘工部机关建在二甲镇东丁坎坝(今海门二甲镇境内)我方秘密交通员陆丕文家。

谢克东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失业回乡的“裁缝”,化名姚克生,是陆丕文的表兄,同时还带来了“母亲”朱姚,安徽桐

城县人,人称“朱老太太”。朱是秘工部的交通员。在敌占区,以什么身份出现、穿什么衣服都要注意。一不小心,也容易暴露自己。

1943年4月,谢克东为深入敌人营垒,决定将秘工部机关从二甲丁坎坝搬到海门茅镇复兴街。因汤仁寿是乙种组织成员,又是谢克东在上海大新公司的同事,所以谢克东到海门和汤仁寿的父亲汤炳文合开了“汤合泰油米店”,以开米店和跑跑班头做生意为掩护,指挥着秘密战线的抗日斗争直至这年秋天。

在谢克东的领导和周密部署下,四地委的乙种组织有序开展。四分区各县都建立了乙种组织。海启县7个区都建立了乙种组织。仅海门境内就有11个支部,117名党员。这些党员,有的是外来和精简下来又未公开工作的党员;有的是从原来党组织中划出来的面目不太“红”的党员;还有的是在乙种组织建立以后发展的新党员。他们利用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宣传教育,和群众打成一片,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并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日伪政权和特务机关内部进行活动,搜集情报,粉碎敌人的反“清乡”阴谋。

打入敌人内部秘密窃取情报

1942年下半年,日伪在苏南“清乡”得手之后,随即策划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清乡”阴谋,派伪政工团团长孙永刚打前站到南通城里来招收伪“清乡”工作人员。打入敌人内部的马世和立即将这一情报报送到谢克东处。谢克东觉得这份情报十分重要,我方可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于是,他开始布阵。他利用林克、李鹤皋、王承志三名同志和孙永刚是关系较深的师生,安排他们打入伪政工团内部,组成一条秘密工作线,伺机获取敌伪“清乡”计划和当前部署等重要情报。

1944年初春,日伪在海启的“延期清乡”受到我方沉重打击后,便气急败坏地在海门三厂镇的日寇军营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强化清乡”的紧急会议,拟从上海增派日军到海启来加强“清乡”,并严令海启两地的伪军政组织紧密配合日军的行动。这是一个很机密的会议,主持者为日寇从上海派来的一个联队长,参加者除了海启地区的日军头目外,还有海启两地的伪特公署署长(即伪县长)率

领其属下的伪科长以上人员。当时已打入伪海门特区公署任教育科长的王承志参加这个会议,回来后马上告诉了李鹤皋这一新的紧急情况,随后李鹤皋也听到参加这个会议的伪政工团副团长的类似传达,于是李鹤皋与王承志分析研究后,由王承志密写成情报,次日李鹤皋就赶赴南通城,将情报送到秘密联络站转交谢克东,使我抗日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取得了主动权。

与此同时,利用关系打入敌特内部的乙种组织成员马世和,在担任四甲坝特工组内勤工作时,发现一份潜伏在我通东地区的8个特务的名单,她立即抄报到秘工部。谢克东与公安部门的同志,经过缜密核查,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从而消除了隐患。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表扬马世和“起了拿枪的军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巧截落入敌手的机密文件

1944年初,驻海门聚星镇的伪政工支团在随日伪军“清乡”时与海启县委组织部部长赵峰遭遇。突围时赵峰因腿部中弹而被俘,他事先藏在河边芦苇荡的一袋文件也不幸被伪政工支团搜去。

文件正好上报到打入敌人内部的伪海启政工联合分团团办室主任李鹤皋手中。他拆开一看,非常震惊,因为这包文件中有不少上级党委和海启县委关于反“清乡”斗争的指示、报告、计划、部署等重要机密文件和材料。特别是其中有几个笔记本上记着不少党组织名称和党员干部名单,有些还有地址;有些几个名字用线连在一起,可能是一条联络线上的一些秘密党员。

李鹤皋当即认定这包文件绝对不能上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进而一想,不报也不行,因为文件收文簿上已登记,团内也有人知道缴获共产党文件的消息,如果隐瞒不报,不仅有暴露身份的危险,还会牵连其他同志。

情况紧急,怎么办?

李鹤皋找王承志商量后,决定利用报告中没有开具具体文件目录清单的漏洞,立即整理出全部文件和材料的目录或提要清单,送到秘工部谢克东处,挑选出已没有价值的文件上报伪政工总团部。李鹤皋如此妥善地处理了这袋文件,既保护了党的组织和同志,又没有暴

露身份。他还受到伪政工总团部的嘉奖。

发挥乙种组织独特作用

乙种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了解(敌占区)城镇社会情况,获取日伪政权的重要情报;通过详细了解这些伪市长、伪保长和伪乡长的情况,弄清楚哪些人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哪些人是勉强应付日本人的,以利于我方的武工队、锄奸队镇压一批汉奸,使那些伪乡长保长不敢大力帮助日寇。

比如,在“清乡”开始时,南通县的公安局长和武工队队长被敌人杀害,谢克东安排“乙种组织”调查清楚是谁向日本人通风报信的,并由武工队化装进镇,杀掉一批汉奸,并在城镇中张贴布告,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为了确保秘密系统的工作方针得到落实,谢克东领导的地委秘工部除开办训练班传授秘工业务知识外,还开展党性教育、气节教育,并按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乙种组织所处不同环境,安排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活动方式。根据地的乙种组织,以群众面目出现,带头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承担义务,团结教育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秘密组织、配合党的公开组织进行活动。在敌占区的乙种组织,以开店经商、办学教书、商贩买卖、搞手工业等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在群众中扎下根来,主要对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比如进行反“清乡”形势宣传,戳穿敌人阴谋、揭露敌人罪恶,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受骗、更不要帮助敌人做坏事。对有觉悟、表现好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要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

谢克东领导的乙种组织作为反“清乡”特殊时期的秘密组织,积极投身于系统的斗争配合,在敌伪占据的主要地区基本上实现秘密工作联系的网络化,为稳准狠地清除日伪安插进我方的特务、暗探以及在敌占区、游击区坚持对与人民为敌者实施坚决打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10月,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秘密工作重点转入城市,苏中四地委秘工部和敌工部合并,成立城市工作部。乙种组织也做了相应调整,根据地的乙种组织撤销,党员转入公开;南通、海门茅家镇等敌占区的乙种组织继续保留,更名“城市地下组织”,坚持斗争,隶属四地委城市工作部领导。如西县秘密县委与公开县委的敌工部合并为县委城市工作部,敌占区的一些党员陆续撤往根据地。

赵宗抃、柳诒徵 爱国诗作谈

□白飞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勉堂,诗人、书法家、文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名满海内,誉盛士林。近年来,他的好友赵宗抃先生也为学界所关注,渐为人晓。张伟羽先生《丹徒赵曾望、赵宗抃、赵遂之一门三代的篆刻艺术》简述赵宗抃书法及其《悔盒印存》;刘聪泉先生作《赵宗抃小传》,录入《东皋印学》;赵一锋先生又撰有《侨士萍踪》诸文,推介赵氏品学。佳作迭出,难免一疏,上述书文有关赵宗抃与柳诒徵的交往往事,区区数言略过,未作深入挖掘。其实两人还有爱国诗作交游。

印人赵宗抃(1874—1947),字蜀琴,号悔盒、悔翁,原籍镇江丹徒,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自幼生活于如皋掘港(今属如东),后于上海、镇江诸地执教。他秉承家学,善诗文、精书法、工篆刻,与柳诒徵、吕思勉、吴寄尘诸君过从甚密,有《悔盒印稿》等传世。

赵宗抃与如皋结缘颇深。《东皋印学》将其小传录入,并非全无道理。赵家人记述,1874年,赵宗抃生于如皋掘港堂子巷公心堂。1915年,他获苏州工业专科学校聘书,举家南迁苏州。前后40余年,赵宗抃客居如皋东乡。其父赵曾望亦精篆刻,又与王俊等东皋印人时有交游,为王俊《读画轩印存》作序。赵宗抃秉承家学,对于东皋印学应不陌生。

赵宗抃一名,诸多书报及拍卖图录中常写作“赵宗忞”,比如《如东日报》刊文《侨士萍踪》。追根溯源,“赵宗忞”一名初现于1930年《墨海潮美术月刊》。赵氏为此刊“撰著编辑者”,其照释文录为:赵宗忞,字悔盒,江苏镇江人。形成鲜明的比照是,同期《墨海潮美术月刊》刊出《赵悔盒书法篆刻润例》:“赵君宗抃……浙江人也”(浙江当作镇江)。同册杂志,同一人两处姓名、籍贯说法都不同,可见此刊可能审阅不严,引出“赵宗忞”一误。查阅其他史料,1909年,赵宗抃参加“京口驻防初选”。《时报》公布开票结果,赵氏名列榜首,刊名为“赵宗抃”。又查其家谱,仍作“宗抃”,未见“宗忞”。总而言之,赵宗抃未名“赵宗忞”。

柳诒徵与赵宗抃结为密友,缘由众多。两人年龄相仿,又是同乡,皆好书法。柳诒徵还视赵宗抃父亲赵曾望为恩师。进一步探讨,两人都有着爱国情操,有诗佐证。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中国军队上阵杀敌抗日,先后爆发南口战役、淞沪抗战。赵宗抃爱国情切,写下两首诗,一为《丁丑仲秋赠南京抗战将领》:夺我平津指顾问,汉奸千古更何颜。凭陵绝塞应无险,扼守中原在此关。誓殁金汤军令重,将拼铁血阵容闲。但教众志成城固,唾手燕云去复还。另一首《丁丑仲秋赠淞沪抗战将领》:烽火无端实怪哉,同仇敌忾撤舆台。三军喋血谋如石,百战攻心志不灰。得地鏖貅多妙略,摩空鹰隼骋奇才。任他骄虏披猖甚,莫使骑轮片甲回。

1937年中秋,赵宗抃直抒胸臆,控诉日寇、汉奸的罪行,吟唱中国抗日必胜。老友柳诒徵也恨日寇。他长期任职南京中央大学。抗战时期,柳诒徵随校迁居四川,怀念赵宗抃诸友,写下《壬午年貲赠伯康,兼怀王伯沅、赵蜀琴、吴眉孙诸贤》(四首录一):周处台边老伏生,年年犒饷石头城。沪滨豺虎吞泉府,蜀道鳞鸿阻驿程。涸鲋伊谁通湿沫,瘦羊怜尔致精诚。龙蛇顿解贤人厄,为我殷勤更寄声。

壬午为1942年,是年柳诒徵从苏中出发,取道上海前往重庆。友人赵宗抃时居上海。柳诒徵长期任职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去沪之前他已在苏中解放区安排好馆中藏书。诗中首联为诗人自比南京伏生(藏书家),可是沦陷区里的旧都里处处是穷困饥饿的百姓。颔联指控日军为虎狼之师,已经掠夺上海的财富,沪川两地的邮路断于兵燹。剩余两联感慨诗人与友人像枯河中的鱼儿、瘦弱的羊,盼望着英雄解此困局,恢复交往。同仇敌忾,志同道合,已成为柳诒徵、赵宗抃深入交游中不可小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下图:赵宗抃《悔盒印存》及其印作(安亭亭长、陶风楼)。



下河地区的青苗会

□嘉玺

海安里下河地区,人们习惯上称为“下河地区”。这是因为流经海安、东台等地的串场河称为“下河”,而京杭大运河淮安至扬州段称为“里运河”或“里河”。故而海安、姜堰、东台一带百姓,就称里下河地区为“下河地区”了。

历史上,通如地区与下河地区都有麦收后举行青苗会的习俗。但两地的青苗会都有各自的个性特征,其目的都是祈求土地神保佑禾苗旺盛,五谷丰登。

据地方文史资料记载,下河地区青苗会系由古代傩舞演变而来,宋代始向娱乐方面发展,内容也大为丰富。民国时期,青苗会在下河地区极为盛行。每年麦子登场,黄秧落地的农历五月,下河地区各地农民均请香火设坛做“青苗会”,亦称“土地会”“太平会”“香火会”或“棒棒会”,祈求土地神及刘猛将军驱除蝗虫,保佑禾苗茂盛、五谷丰收、六畜平安,并借敬神以娱乐热闹一番。

青苗会一般以村庄为单位举办。由几个会首联系香火,搭建会台,筹措经费,由农户按各自的田亩分摊费用。会台是用毛竹、芦苇搭成的两间敞棚,上有苦盖,旁有围栏,供奉“福德正神”。台前竖起高高的木杆,扯上青苗和2丈多长的围旗。会程分开坛和末坛两个阶段,历时一昼夜或两昼夜,通宵达旦。开坛时,马弁去土地庙(土地祠)请土地神神驾来会台就座,一路敲锣打鼓。土地神就座后,由会首进香、磕头、放爆竹,上供(考究者供猪头、雄鸡、鲤鱼,俗称“六只眼”;简单者是肉、豆腐、蛋、茶、米、酒之类)。此时,马弁敲锣、响鼓,唱68刀“交猪”,从猪头数到内脏。开坛后,一个马弁打锣,说几句祝词,而后演唱内容均为神仙显灵、驱邪消灾和祝福百姓平安、五谷丰登之类的小唱,直到天亮,唱词多为七字小调。次日上午,再举行祭祀仪式。午后由会首点唱反映民间生活的小书,如《刘文龙求官》《刘金进瓜》《马前泼水》等。末坛主要是送神、祭祀庄稼和牲畜。有“听刀”“迎丁”等程序。最后由会首敲锣打鼓送土地神回庙。如果安排两昼夜的会程,则在末坛前,白天唱小书,晚上唱大书。

上述风俗因地点不同而略有差异。曲塘西北乡的青苗会在末坛的夜里有两个风俗:一为斩五岳,即由纸扎匠扎一只纸船,上设五岳神纸像,送至村外焚化;一为祭鸡,即由香火杀雄鸡泼血于三岔路口,以祛邪气。有些青苗会在末坛时,还有若干风俗:“盖戳子”,由马弁在大小孩背后盖上“门神法师”的戳子,可保平安;“抢黄子”,在倒旗杆时,把杆顶的黄元旗抢来捂住小孩耳朵,以保小孩耳不聋;“牛过绳”,马弁用石灰水画圆圈,把牛拉到牛棚内换上新绳,旧绳送至土地庙;“插小旗”,在马弁“迎丁”后,各家下田插三角小黄旗,预示五谷丰收;“贴大字”,马弁给会首剪贴双喜、寿字、五福旗,以示吉祥如意。

如今下河地区青苗会及青苗会带起的各类习俗均已不存。

海门南部地区是长江冲积平原(占海门总面积的2/3),其成陆史不过300多年,但有一座古镇——连元镇,却已有约300年的历史,它是海门南部地区成陆后最早形成的集镇之一,今属海门街道德新村。尽管该镇现在由于交通不便而冷落,但它曾经是一座十分热闹的集镇。这座古镇,不仅见证着海门沙地文化的历史,而且还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历史。

两座乾隆年间建筑物

■见龙桥

在连元镇东市梢的连元沙河上,有一座石桥,桥面旁侧刻有“见龙桥”三字,在《清光緒海门厅图志》(编修于1899年)里对此桥有记载(“见龙桥在东天补沙”)。《海门县交通志》(编修于1987年)也有记载:见龙桥“建于清乾隆初年至三十三年(1736年—1768年)……”距今近300年。海门复涨于清康熙、雍正之间(1700年前后),也就是说在海门复涨后不久,见龙桥就已建成,并且保存到现在,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见龙桥的中间桥脚上有这样一副对联,右侧为“源来南北分河海,界过东西判市乡”;左侧为“行人自浚庆登龙,过客茫然烦跃马”。见龙桥全长25米(含引桥),宽2米,3孔,距水面约3米;桥面分三道,即主桥面 and 东、西辅桥面;三道桥面每道都是用四条(每条长约5米、宽约50厘米、厚约30厘米)长方形石条并排铺设而成,桥面共铺石条12根,整个桥面已被千万双铁鞋 and 岁月的年轮摩擦得光滑透亮,依稀可见当年为了增加摩擦力而凿的石纹痕迹。见龙桥远看犹如一只展翅的山鹰,近看犹如站在水中的一个结实壮汉,笑迎着每一位踏上桥面的人。

■石牌坊

石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

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它虽标榜封建功德、宣扬封建礼教,但从中可以窥得中国的历史文化,所以被认为是一个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连元镇的这座石牌坊是一座双节坊,是表扬婆媳俩在她们的丈夫死后,双双守节终身。该牌坊高约4.1米、宽2.35米,坊顶原为重檐式的建筑,装饰精美,由于1949年的一场大风,坊顶掉落。目前只剩下两根立柱,三根横梁(其中两根为梯梁),两根梯梁上均刻有龙纹浮雕;牌坊前二米处立有四根石望柱,柱顶各有一只小狮子且表情不同。牌坊的两根立柱上均有阴刻楷书,但难以辨清,依稀可见的有“海门厅、已故瞿陈氏瞿□□妻节孝之门”等字样,右侧的立柱上还有可辨别的“两代冰霜完节孝”字样。坊文的记载与《嘉庆海门厅志》和《光緒海门厅图志》的记载吻合。说明此坊是经当时的江苏巡抚翁丰额上奏乾隆皇帝后,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十七日乾隆签发圣旨后,动用国库为婆媳俩建的坊。

三处革命遗迹

■木行头战斗

在连元镇西北3里处被称为“木行头”的地方,有一个以两根步枪为标志竖起的纪念碑,这是为纪念海门抗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而立的。1944年11月8日我汇通区队(时连元镇属汇通区)获悉

县城茅家镇的日伪军筑炮楼需要材料,将于第二天由伪区长和伪警察局长带队下乡去强拆民房。我抗日武装觉得这是一个打击敌人的好机会,当即把这个情况向海启自卫团作了汇报。自卫团决定抽调下属六个排、汇通区队3个排投入这次战斗。下午汇通区队埋伏在木行头东侧,通海自卫团埋伏在木行头西侧。敌人强拆民房并进行抢劫后拿着大包小包十分疲惫地返回茅家镇,为我军以逸待劳创造了时机。下午3点,当敌人进入了我军伏击圈时,手榴弹、排枪一起向敌人开火。木行头战斗共打死日本侵略军头目(宪兵队长)屯元以下11人,伪军10余人,缴获机枪1挺,其他枪支20余条。这是日军进入海门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乡财助誓死保公粮

日本鬼子曾在该镇的集市上当着数百群众的面,残酷地砍下了两位烈士的人头,还把两颗头颅悬挂在高处示众。1943年初秋,景德乡(连元镇时属景德乡)财助黄新出色地完成了秋粮征收任务后,为防万一把征收到的现钞和粮食暗藏在山芋地里,随即与另一位乡干部张俊一同去找区党委联系上缴公粮之事。不料在路上被敌人发现并被捕。敌人把他俩捆绑着押进连元镇敌据点。日本鬼子对两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妄图逼供出公粮款存放地点和我景德乡的乡干部